



# 丝绸之路上的旅行者

◆唐华

欧亚大陆是世界最大的陆地板块,大却不意味着道路贯通。翻开地图,欧洲平原和东亚之间横亘着崇山、高原、荒漠和戈壁,以至于互相隔绝。在交通工具简陋、通信手段稀缺的古代,一个人如果从中国长安出发前往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仅仅翻越帕米尔高原就得饱经磨难。加上随时出没的盗匪可能夺人性命,用“九死一生”来形容这段旅程,毫不夸张。

即便如此,这条危机四伏的长途却总是络绎不绝,人流不息。其中相当一部分旅行者,化作白骨,成为“丝绸之路”上的警示路标。究竟是哪一些人,甘愿冒死亡风险,沟通欧亚大陆两端呢?我们不妨以美国学者斯图亚特·戈登的《极简亚洲千年史》(618-1521)为范围,做个样本统计。在这本21万字的著作中,戈登讲述了8位旅行者的故事,其身份可归为3类:信徒、使臣和商人。他们构成了丝绸之路的主体人群。

为什么偏偏是这3类人?在我看来,一切皆源自他们背后的驱动力:宗教信仰、权力意志和商业利润。正是这3种驱动力,将一代代信徒、使臣和商人推上陆地和海洋,连绵不绝地进行着跨地域、跨文化交流。这3类人的驱动力各自不同。对信徒而言,传播宗教理念无疑是最强烈的动机,个人安危算不得什么。这方面的代表,如玄奘法师。玄奘不顾唐初禁令,偷渡过关,穿越“八百里流沙”时断水断粮5天4夜,几乎丧命。没有求取真经的坚定意志,是不可能做出这一壮举的。

促使使臣们跋山涉水的,则是权力。所谓“凿通西域”,实为汉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的副产品,而使臣张骞为此舍命异域十多年。可见帝王的意志多么强劲。《极简亚洲千年史》还单辟一章介绍了“郑和七次下西洋”,其规模和时长都首屈一指,更是国家意志和国家财力的体现。商业的力量同样巨大。马克思说“资本如果有50%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何况几倍、几十倍?丝绸之路上运载的多为丝绸、瓷器、珠宝、香料等奢侈品,从产地运到销售地,价格翻几番。巨大的诱惑让人们趋之若鹜。

12世纪的亚伯拉罕·本·易尤做的就是香料生意。他的商船满载黑胡椒、肉豆蔻,经地中海和东海,横渡阿拉伯海,抵达印度西南港口门格洛尔。以此为中转站,香料贸易传遍东南亚和东亚。作为中间商的易尤因此致富。千百年间,信徒、使臣和商人各怀目的,辗转迁徙于丝绸之路之上。这并不是说这3类人各行其是。功利地看,他们至少是互相需要的。信徒需要君王和商人作赞助人,供养日常生活,支持传法活

动;商人需要权力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以保障财产,也需要宗教以安放灵魂;君王则利用宗教为统治背书,笑纳商人的税收和进贡丰盈府库。

以玄奘为例,经历生死考验后,他来到信奉佛教的高昌国。高昌国王鞠文泰款待了他,并备好金银、马匹、随从等。此后玄奘一路上受到各地统治者的热情奉养,顺利抵达印度。若缺少世俗权力的护送,他能否成功,是要打个问号的。而且,玄奘动身前佛教就已在中亚扎根了,这当然是统治者力推的结果。

宗教传播又反过来促进了贸易。由于信徒对宗教用品的渴求,使其成为重要货品,自有商人千里迢迢贩运。而沿途的寺院,为商人提供了补给点。商人呢,则是寺院的主要赞助人——旅途凶险,他们需要神灵护佑。15世纪-17世纪,亚洲迎来伊斯兰教第二波扩张,商人就充当了重要

角色。商人也需要统治者。陆路上劫匪横行、海路上海盗出没,死难者不计其数。只有强大的政权才能重铸社会秩序,维护商道安全。罗马帝国强盛时,丝绸之路沿途各地区政治稳定、贸易畅通。待罗马陷入内忧外患,贸易立刻受挫。在《极简亚洲千年史》所叙述的历史时段(618-1521年)里,这种情况屡屡重演。唐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莫卧儿帝国……每一次大国兴衰,都会深刻影响丝绸之路的政治格局和经贸生态。长安、巴格达、撒马尔罕衰落,没关系,北京、苏门答腊、马六甲将接班成为新的政治、文化和贸易中心。

如此看来,宗教、权力和商业从来都难分难解。它们共同推动了亚洲与欧洲持续千年的交流,并形塑了各地区的社会形态。同时,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朋友圈”逐渐形成,动物、植物和人造物在圈子里流转交换,共同演绎着一段段奇妙的旅程。稻米原产于中国,后来稻米种子及种植技术传入东南亚,成为当地主食,如今“泰国香米”享誉世界。旅行者还将稻米带到北亚草原,在那里,它被尊奉为高级食材。永乐13年,郑和使团从东非运回麒麟(即长颈鹿),中国人开始培育长颈鹿。同时期的东南亚,中国铁锅和泰国鱼酱是获利最丰厚的商品。巴格达花砖、哈里发国银币、中国陶瓷与丝绸、大马士革刀的廉价复制品,更是遍布欧亚,为普通人享用。戈登还注意到,亚洲君主普遍使用遮阳伞、拂尘、鼓、号角作为权力象征物,也都喜欢赐给臣子华服。

显然,这个“朋友圈”越来越庞大,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无所不纳。但,没有任何一种国际结构是恒定的,变化总是潜伏在平静的表面之下。在丝绸之路不断绵亘的多年时间里,那些旅行者们促进了文化交流,让世界联系得更紧密。



## 传承人制度详解

2008年,文化部出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并于当年6月起正式生效。这是我国第一次以专门文件的形式确定了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这一非遗保护中重要主体的身份与资格认定。办法中明确了此传承人是“承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传承保护责任,具有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的传承人”,同时也规定了他们的责任与义务。

但这并不是国家级传承人这一称呼第一次出现,在2007年,文化部就已经认定并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名录,共计226人。2008年1月公布了第二批551人。至于传承人这一说法,则更早,可追溯到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就已经出现了“传承人”的字样,而几乎同时,时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冯骥才先生推动开展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并组织认定了164位“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编写了两卷本的名录。

这是我们谈论“传承人”制度,所需要了解的背景——不是所有的传统继承人都可以被认定为“传承人”,影响力、专业能力以及非遗本身的珍贵性,都是影响这一身份认定的重要标准。

到了2011年2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正式决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明确授予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可以认定代表性传承人”的权利,才终于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国家-省-市-区(县)四级传承人制度。其中省-直辖市市级名录的工作开展较早,如上海市于2008年10月公布第一批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地级市-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名录稍晚,约在2011年。因此,若按照时间顺序的话,国家级传承人的出现在先,以下3级传承人,则属于后建立起的分级保护,各级各类“传承人”之间,既无上下隶属关系,也非向上排队晋升的途径,而只是扩大保护范围的一种举措。原则上来说,任何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都是国家传承人,区别只是在于他们的代表性有多大。

反过来说,一项国家级非遗中,完全可以没有一个传承人,因为都不具有代表性。只是,在后来的观察中,“四级传承人”制度似乎渐渐从时间顺序,发展成了逻辑顺序,从区县级-市级-省级,最后到国家级,这样一套逐级上升的管理程序。事实上,依然有不少非遗项目,在时光流逝中很难找到自己的“传承人”,导致某一传统手工艺的血脉就此中断。无论哪一种传承人,“手工艺”不同,却都是我国传统民间文化的后继者,在各自的领域中为文化保留了一丝火种。薪火相传,代代传承,他们的付出值得我们满怀敬意。



■ 第一种传承人:他们未必是带有官方标签的“传承人”,却是传统文化最后的守护者。

法师,踩着锋利的刀锋,翻腾腾挪,一步步爬到梯顶,吹响号角,围观的人群欢声雷动。

巴岱的传承一般只在本民族内,遵照严格的传承方式。苗族因为没有文字,因而巴岱文化在传承中也主要依靠口耳相传,且传承主要是在家族内部传承,传子不传女,无子则传承给堂侄、上门女婿等。不同巴岱支脉的传承人共同分享着一种对于仪式传统的严苛尊崇。苗族没有家谱,传承时只需焚香祷告,告知被传承人前代祖师即可。随着村中老人逝去,许多传承情况也无从考证了。

此后,海派剪纸被文化部纳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二代传人奚小琴与赵子平先是一起被评为上海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此后,因为奚小琴在传播推广海派剪纸艺术上的努力,又被评为剪纸艺术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二人的剪纸虽同出一脉,又多有不同,赵子平擅现场剪纸,倏忽成形,龙飞凤舞,线条古拙中蕴含着雅趣,继承了王子淦先生的大气华贵的特点;而奚小琴擅剪人物,套色明艳,一幅《窗前》,人物娇俏,春色在眼。

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工作中,认定的非遗标准是由父子(家庭)、师徒、学堂等形式传承三代以上,传承时间超过100年,且要求谱系清楚、明确。像王子淦先生和两位徒弟的传承方式,就属于此类。

负责文化工作的李湘满在与当地老人的聊天中,听说幡花灯笼不具骨架,针刺成花,于是动了恢复这门传统手工艺的念头。

李湘满走访年迈的传统艺人,学习、摸索制作针刺无骨花灯,重现了这门绝技。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创设了花灯技艺培训班,后来又设立研究所,开起了名家工作室。在针刺无骨花灯进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李湘满也理所当然成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老人的几位弟子近两年也先后评上了省级或地市级传承人。

◆ 特约撰稿 钱斌

巴岱文化是湘西苗族本土文化,同时也是湘西苗族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巴岱”是古苗语的发音,指祭祀仪式及仪式主持者的代称。不同于好莱坞大片里挥舞木杖的魔法师,日常生活中的巴岱们更像是一位为乡民解决生活困境,传续古老知识的长者、智者。祭家先,建新房,看病求医,祈福镶灾等,苗族人民传统生活中,总有巴岱的身影。当然,还有最让游客们着迷的“上刀梯”,开阔的平地中间,竖起一根几层楼高的木杆。身穿民族传统服装的

■ 第二种传承人:他们是国家认定的传承人,有记录详实的传承谱系可查。

中国的剪纸从南到北,实差异极大。北方的剪纸主要表现形式是窗花,因此造型朴实生动,气息天真浑厚;而南方如江浙地区的剪纸,主要表现形式为绣花纸样,因此造型多以花鸟为主,娟秀灵动、玲珑剔透。

我认识两位著名的工艺美术大师,海派剪纸王子淦先生的传人赵子平和奚小琴。而两位的业师,生于江苏南通的王子淦先生则在南方剪纸的基础上,容纳北方的大气华丽,最终在上海的工艺美术研究所自成一派,既成了国家特级工艺美术大师,更开创了海派剪纸这一重要的手工艺门类,几位弟子也都各自成了大师。

■ 第三种传承人:本身不在传承谱系内,因掌握了某一非遗绝学,也被认定为传承人。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幡花乡的传统民间灯彩工艺——针刺无骨花灯技艺,是有“中华第一灯”美誉的传统工艺,相传起于唐代。民间传说里,美艳倾城的杨贵妃去世后,负责保护她的两位将军逃难到此,以制作宫中玲珑剔透的无骨花灯为生,因此也就使得这门御中手工艺得以流传。到了近代,渐渐断了传承。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当地镇文化站负

# 承继传统文化的火种

传统文化  
承继火种  
Chuan Culture  
Inheritance

流光飞舞

漫长的人生里要与许多事物相遇,哪怕小小的一块土地。

乡下一位老人逝去一年,我们一行人回去祭奠她。焚香烧纸结束后,我站在老人墓地放眼望去,冬日里的远山被袭来的薄雾笼罩着,朦胧而又神秘。墓地右前方刚刚翻过的一块土地进入我的视线。似曾相识的位置,让我想起什么,我就沿着池塘边朝它走了过去。

那是我14岁时拥有的一块土地。那时土地有限,此前我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尽管14岁并不代表具备了干农活的能力。我还意识不到这意味着什么,高兴的是父母,多一块土地就增加了一份收成的可能。

周围的几块地,或杂草丛生,或改变了形状被挪作他用,只有这块地维系着原样。我站在它的边缘,在田埂上它与我对视,不敢再踏进一步,生怕自己留下的一个脚印会打扰它的整个生命。

长方形的地,棱角分明,面积不过50平方米左右。挨着池塘,水源便利又充足。所以,它曾是我家格外重视的一块地。玉米、小麦、红薯……不管种什么,都能带来良好收成。农作物出类拔萃,以良好的长势标志性地耸立在地里,每一个收获季节,父母都会从那一块地满载而归。多少年过去了,土地边际没有改变。泥土还是我第一

# 与一块地相遇

◆曹永胜



次见到的那些泥土,甚至更加新鲜。暗红的泥块上带着一点锄头的痕迹,地里甚至没有留下任何脚印,让人感叹主人真是一位锄地的好手。弯腰下去掂一掂泥土,用手指轻轻一捏,就闻到了它的芬芳。泥土的清香进入鼻子,一些记忆瞬间就被打开了。

如果20年前,这块土地的翻新一定是由我父母完成的,也许我还在他们旁边充当一个小小的帮手。我坐在田埂上,时而低头,时而仰望,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看蚂蚁从脚趾爬过,看蜻蜓从身

边飞过。有时候,我站在池塘边,拿起细细的一根木棍或树枝放在水里轻轻搅动,我以为那就是大人们常玩的钓鱼。听到父母唤起“三娃”,我才跑过去为他们递上开水,或者在不远的树上摘几个别人家的桔子给父母解渴,被父母知道真相骂了后,灰头灰脑地走开,还得意地笑着。

父母在地里播种和收获,用欢声笑语与漫山遍野劳作的乡亲们遥相呼应。一块小小的土地,人们反复耕耘,耕耘自己的希望和明天。每一块土地都有三三

两两的乡亲,热闹非凡。人们干农活的姿态构成了一幅充满韵律而又和谐的乡村风景画。而现在,不知谁在耕耘这一块曾经属于我的土地,也许已换了多位主人。不知四季里还会有什么农作物从地里生长出来,但我相信它一定能让每一位主人笑颜频开。

在它面前,我们相互对视,彼此陌生,却又像多年未曾谋面的亲人。父亲走后,家里劳力有限,母亲不得已舍弃了很多土地,但没有舍弃这一块。直到母亲进城后,彻底离开土地,才告别了它,并交给了信任的乡亲。但母亲没有断绝与土地的联系。每到24节气来临,她都会念叨着,这个时节该种什么农作物,以此怀念在乡下的日子。她让我们也不能断了与土地的关系。每一次返乡,临别前乡亲们都会捧出特产热情赠送。这是那一片土地上最高贵的礼物,却让我受之有愧。

今天,这块地周围却增加了几座坟。坟地埋葬的是曾经在这里耕种的人。他们长眠于此,便与土地融为一体,永远眷顾着这片土地。不远处,一棵直耸云天的松树还保持着我第一次见到它时的姿态,默默注视着世间的一切。离开时,我坐在车里远远看着那一块地,就像告别一位亲人。与这一块地相遇,或许不是相遇,是久别重逢。

艺海拾贝



2017年西班牙CCACO第三届中国文化节“同行·西班牙印象”国际青少年儿童公益绘画与摄影大赛成功举办。因为大赛中由江苏省苏州市易同同学绘制的获奖作品《苏州印象》,作品用简单的线条勾勒出苏州别致的一景,展现了我国江南水乡的秀丽。